

安倍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 结构性改革研究

——基于法国调节学派基础理论的分析*

吕守军¹, 严成男²

(1.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030;

2. 日本新泻大学 经济学部, 新泻 9502181)

[关键词] 安倍经济学; 企业主义的调节模式; 输出主导型积累体制; 日本型雇佣体制; 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

[摘要] 本文首先基于法国调节学派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关系的理论, 对安倍经济学之前的日本传统型雇佣体制和新日本型雇佣体制的内容和特征进行了梳理, 认为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大量增加是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 其次, 对安倍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认为安倍经济学使日本雇佣体制发生了质的恶化; 最后, 对安倍经济学带来的表面上的经济繁荣进行了分析, 认为安倍经济学只能带来短期的虚假的繁荣, 从长期来看有可能是日本经济“失去的30年”的开始。

[中图分类号]F1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4)03-0021-10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及问题的提出

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是指安倍晋三于2012年12月26日成为日本第96任首相后提出的一揽子政策^①。从政策的具体内容来看, 主要

有三个: 第一, 大胆的金融政策: 日银放松对金融的规制, 促使日元贬值和物价上涨2%, 设立由政府、日银和民间共同参与的外债基金; 第二, 灵活的财政政策: 以对公用事业的投资为主, 在未来10年投资200兆日元用于桥梁、道路和港口的建设; 第三, 以唤起民间投资热情为目的的经济增长战略: 对劳动力市场、能源、环境、健康和医疗等领

* 本文系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前沿研究”(项目号:10CJL001)、2011年度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法国调节学派最新发展研究”(项目号:12ZS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2013-12-24

[作者简介] 吕守军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 严成男, 日本新泻大学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

① 20世纪70年代, 美国的卡特总统首先使用了“卡特经济学”的术语。但与“卡特经济学”不同的是, “安倍经济学”具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影子, 主要采取了政府干预经济管理、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

域进行结构性改革^①。从政策的目标来看,主要有两个:第一,解决日本“失去的20年”中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经济问题,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第二,解决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等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从图1“安倍经济学的运行机制”来看,它主要由三个层次的经济循环组成。“第一个层次的经济循环”是指位于图中最中心位置的经济循环,其“原动力”是安倍政权实施的“经济增长战略”,该“动力”推动“企业经营业绩的提高”,继而“推动企业扩大投资→推动企业增加劳动者雇佣数量和收入→推动劳动者扩大消费→进一步推动企业经

营业绩的提高”;“第二个层次的经济循环”是指位于中间层次的经济循环,其“原动力”是“劳动者雇佣数量和收入的增加”,该“动力”“推动宏观经济环境好转→推动企业接受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战略’的实施→推动企业积极地采取扩大经营战略→进一步推动宏观经济环境好转”;“第三个层次的经济循环”是指位于图1最外层的经济循环,其“原动力”是“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好转”,该“动力”“推动财政体制的健全→消除由于利息长期增长引起的风险、促进投资和消费扩大→推动经济复苏→推动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推动财政体制的健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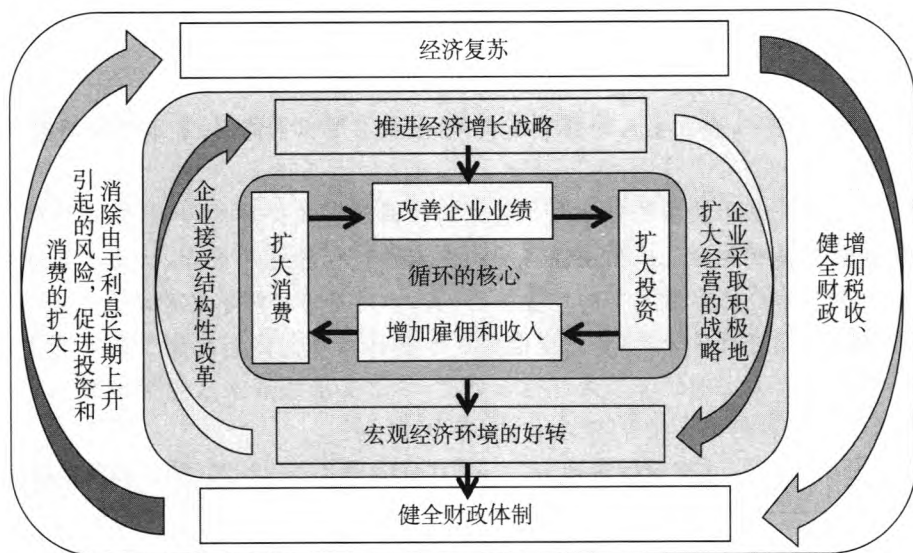


图1 安倍经济学的运行机制

资料来源:根据2013年瑞穗综合研究所的相关资料整理。

可以看出,这三个层次的经济循环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能否“增加劳动者雇佣数量和收入”是安倍经济学能否成功的关键。首先,从“第一个层次的经济循环”来看,如果不能“增加劳动者雇佣数量和收入”就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不能使企业的经营业绩得到切实的改善。从图1可以看出,安倍政权实施的“经济增长战

略”也可以推动“企业经营业绩的改善”,但它只能发挥一时的作用,而长期的、持久的“动力”只能是“劳动者雇佣数量和收入的增加”。其次,从第二个、第三个层次的经济循环来看,“增加劳动者雇佣数量和收入”是第二个层次经济循环的“原动力”,也就是说,没有它就不可能有第二个层次的经济循环,更谈不上第三个层次的经济循环。总

^① 这三个经济政策领域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其中的经济增长战略是指设置“产业竞争力会议”等改革领导机构,放松对员工解雇的规制、降低企业所得税、加入 TPP、推进企业并购、重新使用核电站。另外,也有人把2020年东京成功申办奥运会称为“安倍经济学的第四支箭”。

之,安倍经济学对日本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内容,以及它能否实现“劳动者雇佣数量和收入的增加”,应该是我们对安倍经济学进行考察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

综观国内外对安倍经济学的研究,可以说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安倍经济学能使日本摆脱“失去的20年”的阴霾,并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例如克鲁格曼(Krugman, 2013)^[1]、本田悦郎(2013)^[2]等认为,通货紧缩政策是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元凶”,而安倍经济学实施的“大胆的金融政策”可以消除这一“元凶”。第二种观点认为,安倍经济学有悖于经济学常识、漏洞百出,甚至是“傻瓜经济学”^①。^[3]例如山田久(2013)^[4]、浜矩子(2013)^[5]、野口悠纪雄(2013)^[6]等认为,安倍经济学忽视了日本国债高筑和实体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在这些问题尚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之前,实施“大胆的金融政策”和“灵活的财政政策”有可能导致国债价格下跌并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中国学者易宪容(2013)^[7]、中国台湾学者苏显扬(2013)^[8]等也对安倍经济学的具体内容和效果进行了分析,但普遍持悲观的态度。

目前,安倍经济学实施了仅仅一年,仅从宏观经济数据上对其进行评价可能为时尚早。但从理论上对安倍经济学的运行机制进行分析和推敲,则有利于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安倍经济学。但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来看,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似乎尚不充分,尤其以安倍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尚不多见,这不仅不利于我们全面认识安倍经济学,也不利于我们对其进行价值判断。

另一方面,创立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的法国调节学派,对二战后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历史变化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上的分析框架。与

国内外已有的研究不同,本文将在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基础上,对安倍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内容进行考察,重点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我们全面认识安倍经济学、把握日本雇佣体制的新变化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二、安倍经济学之前的日本型雇佣体制

(一)日本“企业主义”的调节模式

法国调节学派的分析框架中最核心的概念是“积累体制”和“发展模式”。积累体制(régime d'accumulation)也称为“增长体制”、“增长模式”,是指维持第一部门(生产部门)和第二部门(消费部门)相互平衡的再生产模式,是资本主义各个时期各个国家中长期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调节模式(mode of régulation)是使积累体制得以稳定的习俗、制度、组织形式、社会网络和行为类型的社会突现性结构。^{[9](P74-80)}博耶(1990)认为,“调节模式是在相互斗争(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斗争)、相互竞争(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和行为主体之间的日常行为习惯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保证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实现。个人的行动体现了社会的习惯和组织内部的规范,而这些习惯和规范被称之为调节模式。”^{[10](P43-45)}调节模式主要由雇佣劳动关系制度、货币·金融制度、竞争形式、国家制度和国际体制等五种制度构成。可以看出,雇佣劳动关系制度是调节模式的一个主要内容,它制约着积累体制的发展。法国调节学派认为,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若它们在变化之中相互匹配,就能够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不匹配则导致资本主义危机。而对于积累体制和发展模式之间历史变化及相互关系的考

① 日本同志社大学商学研究科浜矩子教授于2013年5月对安倍经济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第一次把“安倍经济学”称为“傻瓜经济学”(日语为“アホノミクス”)。目前这一叫法被日本各界广泛引用。浜矩子认为,安倍经济学通过日元贬值使经济恢复活力的方法,“沾光”的只是股票和不动产的持有者等富裕阶层中的一部分,它与“企业经营业绩的增加”、“劳动者雇佣的增加”、“劳动者工资的增加”没有必然联系。由于日元贬值,导致从国外进口资源和原材料的企业经营成本增加,这些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反而会降低劳动者的工资。具体内容请参见:浜矩子,インタビュー「アホノミクス」が5つの悲劇を引き起こす!,東洋経済オンライン,2013年5月24日。

察,构成了该学派的理论框架。本文也将在这一分析框架下,对安倍经济学进行考察。

关于日本的积累体制,宇仁宏幸(1998)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形成了“出口主导型”的积累体制。^[11]关于日本的调节模式,山田锐夫(1999)认为,二战后日本形成了“企业主义”的调节模式。^[12]为了加深对日本调节模式的理解,宇仁宏幸(2009)^[13]和严成男(2011)^[14]对调节模式的类型进行了细分。首先,他们把调节模式划分为“市场的调节”、“制度的调节”和“国家的调节”三种类型;其次,他们以“调节的主体是企业还是社会”为分类标准,把调节模式进一步划分为五种类型:(1)以市场为主的调节模式;(2)以企业的协调和企业的阶层性为主的调节模式;(3)以社会的协调为主的调节模式;(4)以国家干预为主的调节模式;(5)以国家主导的协调为主的调节模式,如表1所示。具体而言,(1)“以市场为主的调节模式”是指主要依靠价格机制对经济进行调整的方

式,代表性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等盎格鲁-撒克逊型资本主义国家。(2)“以企业的协调和企业的阶层性为主”的调节模式是指企业通过内部协商实现劳资之间的妥协,通过企业之间垂直统一的分工关系实现对经济的调整,代表性国家主要有日本和韩国。(3)“以社会的协调为主的调节模式”是指以整个产业甚至整个社会的劳资协议为基础对经济进行调整的方式,代表性国家主要有德国和北欧各国。(4)“以国家干预为主的调节模式”是指国家逐渐缩小经济管理的范围,但对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和企业仍然保持直接或间接影响的调整方式,代表性国家主要是中国。(5)“以国家主导的协调为主的调节模式”主要指为了避免“市场失败”和“负的外部性”而采取政府规制,也指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国家主导使国民的意愿达成一致的过程”,这一调节模式在各个国家普遍存在。

表1 调节模式的五个类型

调节主体	调节模式		
	市场的调节	制度的调节	国家的调节
以企业为主体的调节		(2)以企业的协调和企业的阶层性为主(日本、韩国等)	(4)以国家干预(直接的、间接的)为主(中国等)
以社会为主体的调节	(1)以市场调节为主(美国、英国等)	(3)以社会的协调为主(德国、北欧各国等)	(5)以国家主导的协调为主(在各国普遍存在)

资料来源:根据严成男:中国の経済発展と制度变化,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P4,表0—1作成。

当然,无论哪一个国家,这五种调节模式都同时存在,只不过每种调节模式在不同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其重要性有所不同而已。而且这五种调节模式的组合方式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例如,即使是在市场调节为主的美国,2008年“金融主导型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崩溃之后,也采取了国家购买不良债券、向大企业注入公共资金、对金融衍生产品进行规制、强化和健全金融机构的财务管理等措施。这些措施都是第五种调节模式的表现。

(二)日本型雇佣体制的特征及其历史变化

通常,理论界把二战后日本雇佣体制的历史变化划分为两个阶段,即1955—1990年的“传统

型雇佣体制”和1990年至今的“新日本型雇佣体制”两个阶段。虽然安倍晋三自2012年12月上台至今仅一年,从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之为一个历史阶段,但为了突出对这一时期雇佣体制的考察,本文把它称之为“安倍型雇佣体制”。

(1)日本传统型雇佣体制。

日本传统型雇佣体制是指日本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形成、在后来时期有所变化的雇佣体制。^{[15](P37)}它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企业内部形成了长期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以企业为主体实施职业培训、按照企业的类别进行劳资协商等制度;另一方面,在企业外部形成了企业之间的“企业集团和系列制

度”^①、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主银行制度”^②、银行与政府之间的“护航制度”^③。无论是企业内部的制度还是企业外部的制度,它们都具有“制度互补性”的特征^④,即存在着相互支撑、相互强化和相互补充的关系。这一“制度的互补性”特征具有促进劳资妥协和经济增长的功能。^[16]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传统型雇佣体制”还具有“企业主义”的“内在灵活性(internal flexibility)”的特征。这里的“内在灵活性”是指经营者保证工人获得长期稳定的雇佣(job security),在此前提下工人接受企业对他们进行的职业培训、接受在各个岗位上轮岗并最终被企业培养成能够掌握多种技能的“多能工”。^{[12](P25)}这里的“企业主义”是指这些职业培训工作不像欧洲那样都是由社会的培训机构实施的,而是在同一个企业内部或者在企业集团内部以企业为主体实现的。与这一特征相对应,日本的调节模式也被称之为“企业主义的调节模式”。

(2)新日本型雇佣体制。

“新日本型雇佣体制”的形成背景主要有:第一,1992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一些大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开始采取自己生产零部件的经营策略,另一些大企业即使仍然委托小企业生产零部件,但也不再局限于仅仅委托有协议关系的小企业,这导致“企业集团和系列制度”被逐渐瓦解;第二,企业大量地采取了股票上市等直接融资的方法,并提高了外国人持有股份的比例^⑤,使

“主银行制度”被逐渐瓦解;第三,1999年小渊内阁对劳动派遣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正,放松了对劳动派遣的规制。2004年3月小泉内阁对劳动派遣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正,允许制造业也采用派遣工。

从“新日本型雇佣体制”的内容来看,主要是企业大量地采用了非正规雇佣劳动者^⑥。究其原因,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迅速恶化,如果仍然保留长期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伴随正规雇佣劳动者平均年龄上升,企业的工资成本必然增加。为了降低工资成本,企业开始增加了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数量。从对劳动派遣法进行第一次修正的1999年之前的企业工资总额来看,1979年是94兆日元,1998年增加到223兆日元,20年间大约增加了2.4倍。但1999年之后,企业工资总额开始下降,到2007年下降到200兆日元以下。^{[17](P34)}

从“新日本型雇佣体制”的影响来看,企业大量地采用非正规雇佣劳动无疑有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和获取利润,但却大大地降低了全体劳动者的收入,拉大了正规劳动者和非正规雇佣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导致消费者需求下降,从而不利于企业投资和扩大再生产。

众所周知,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消费、投资和国际贸易。但由于劳动者收入下降并导致社会总需求下降,进而导致政府和企业的投

① 企业集团和系列制度是指在战后日本各个大企业之间相互持有对方股权而形成的各个企业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合作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银行业被反复地合并,导致大企业间相互持有的股权减少,致使该制度被逐渐地动摇。

② 主银行制度是指,银行不仅是大企业的债权人,而且是企业的大股东,它通过向企业贷款和派遣董事的方式对企业的经营进行监督和控制的制度。

③ 原本是军事用语。二战后,为了稳定金融秩序、确保经营能力和竞争力最差的弱小金融机构不倒闭,日本的金融机关(大藏省、日本银行)制定了大量的行政指导政策,防止了金融界的过度竞争。之后,“护航制度”扩展到了全日本各个行业。1995年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该制度被逐渐地动摇。

④ 制度的互补性是指,某一个制度的存在会对另一个(些)制度的存在和发展起到强化、补充的作用。此概念最初由比较制度分析学派(青木昌彦)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法国调节学派开始引进此概念。

⑤ 从2013年10月2日东京证券交易所公布的《平成24年度株式分布状况调查》来看,1990年外国法人的股票持有率在全占全部股市的4.7%,2012年上升到了28%。另一方面,国内金融机构的股票持有率从1990年的43%下降到2012年的28%,国内事业法人的持有率从1990年的30.1%下降到2012年的21.7%。

⑥ “非正规雇佣劳动者”主要指“临时工”、“钟点工”、“派遣工”、“短期合同工”等。

资下降,日本只能寄希望于“国际贸易”,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主导型积累体制”。但日本是资源缺乏型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是先进的技术。而技术的开发主要依靠劳动力的大量投入或人力资本的提高。但由于日本的人口结构出现了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不可能依靠劳动力数量的大量投入,而只能依靠人力资本的提高。从上述对日本“企业主义”调节模式的分析中可以知道,日本对人力资本的提高主要依赖于企业对劳动者的职业培训。但不幸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大量地采用了非正规雇佣劳动者并减少了对他们的职业培训,导致日本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素质下降,阻碍了日本人力资本和生产力的提高,导致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持续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有:第一,企业对非正规雇佣劳动者实施职业培训无疑会增加企业的成本;第二,非正规雇佣劳动者接受的职业培训越多,他们的职业技能和创新能力会提高得越快,当他们成为熟练工和多能工之后要求企业为他们涨工资的可能性就

越大,这会进一步增加企业的工资成本;第三,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相对较短、流动性较大,当他们被辞退后有可能流入到其他企业,那么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和技能会外溢到其他企业,提高其他企业的竞争力,即产生正的外部性外溢的现象,而其他企业大多数是本企业的竞争对手,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从表2可以看出,与正规劳动者接受的企业内部职业培训等相比,除了对“合同工”的职业培训相对较多之外(这是因为一部分“合同工”有可能转成正规劳动者),对“特约人员”、“派遣工”、“临时工”、“钟点工”等其他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职业培训远远低于对正规劳动者的培训数量。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人数越来越多,2000年达到了1273万人,2007年达到了1732万人,2012年12月在安倍晋三上台之前达到了1813万人,占全体劳动者数量的35.2%。总之,这一趋势发展得越快,日本在国际贸易方面的比较优势就下降得越快。

表2 各种制度在不同就业形态中的适用状况(正规雇佣工为100)

	雇佣保险	健康保险	福利退休金	退职金制度	奖金制度	企业内教育培训	自我启发援助制度
合同工	77	71	67	25	68	88	91
	72	71	69	20	73	111	106
特约人员	80	81	79	22	81	69	62
	75	75	72	17	83	89	77
派遣工						55	23
						70	23
临时工	24	15	14	13	25	69	33
	10	7	6	4	6	24	6
钟点工	53	36	33	11	47	53	26
	58	39	36	14	50	69	47

注:上段是2000年的数值、下段是2010年数值。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0年和2010年的《就業形態の多様化に関する総合実態調査:事業所調査》的数据整理。

从上述分析可知,“新日本型雇佣体制”的主要特征是企业大量地雇佣非正规雇佣劳动者,导致劳动者的整体收入持续下降,进而导致社会需

求持续下降,阻碍了政府和企业的投资;与此同时,企业倾向于减少对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职业培训,企业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下降,阻碍了社会

生产力的提高,降低了日本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雇佣形态的变化,日本“企业主义的调节模式”阻碍了“出口主导型积累体制”的发展,导致日本经济停滞不前。

三、安倍型雇佣体制的内容及存在的问题

自安倍晋三上台以来,相继成立了“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产业竞争力会议”和“规制改革会议”等经济改革机构。从这些机构出台的政策中可以看出,安倍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的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容和方向。^{[4](pp2-16)}

首先,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第一,在雇佣形式方面,2013年6月创造出“限定正社员”的雇佣形式。所谓“限定正社员”是指根据合同决定劳动者的职务、工作地点和劳动时间的一种雇佣方式。这种雇佣形式的优点在于,它比非正规雇佣劳动者中的“临时工”、“钟点工”和“派遣工”稳定,但没有正规劳动者稳定,比正规劳动者更容易被解雇。目前,安倍政权正在讨论设立“国家战略特区”,并计划把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最长雇佣年限由5年延长到10年,这无疑将进一步降低“限定正社员”的稳定性。

第二,在财政政策方面,设立了促进企业采用新工人和增加劳动者工资的财政补助金。但这一制度受到了各界的质疑:(1)安倍经济学规定,政府以税收补贴的形式把工资上涨额的10%返还给企业,也就是说企业给劳动者增加10万日元的工资,政府将给予该企业1万日元的税金返还。这样的政策是否有效?各界普遍持有怀疑态度。(2)即使上述政策有效,但该政策只针对纳税企业。依据日本国税厅2010年的统计,日本73%的企业经营赤字,也就是说上述的税收返还政策与3/4的企业没有关系。(3)一些企业为了获得采用新工人的补助金,纷纷增加了非正规劳动者而不是正规劳动者的雇佣数量,甚至一些企业在

获得补助金后就马上辞退这些新工人。可以看出,这样的补助金对于推动非正规雇佣劳动者向正规劳动者升格方面来说没有任何作用,相反却促进了非正规劳动者的不稳定性,拉大了正规劳动者和非正规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18]

第三,在解雇劳动者方面,制定了解雇劳动者的法律,明确了解雇劳动者的资金补偿标准。这一做法实际上放松了对企业解雇劳动者的规制,使解雇劳动者变得比以前更容易。尤其在国家战略特区这样的规制被进一步放松,使国家战略特区成为了“解雇特区”,受到了各界的批判。

第四,在劳动者最低生活保障方面,安倍政权于2013年4月出台了如下的政策:(1)把生活保障金的支付标准下调10%^①;(2)对劳动人口领取生活保障金的时间进行限制;(3)生活保障金采取实物配给方式;(4)对医疗费等医疗扶助的支出额进行限制;(5)委托民间的社会福利工作者对接受社会保障金的劳动者进行调查。据统计,日本的最低生活费应该在16万—21万日元之间(由于各地的物价不同而有所差异),但现行的生活保障金是每月138839日元,远远低于最低生活费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下调最低生活保障金,对于贫困者来说无异于一次沉重的打击。

其次,安倍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的结构性改革至少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安倍经济学在维持劳动市场稳定方面无所作为。从第二节的分析中可以知道,雇佣形式的变化即企业大量地采用非正规雇佣劳动者是日本跌入到“失去的20年”的重要原因。因此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稳定劳动力市场,推动企业大量地采用正规雇佣劳动者。但从安倍经济学的内容来看,似乎在背道而驰。从日本总务省2013年11月12日发表的《劳动力调查》来看,2013年第一、二、三季度正规雇佣者人数分别减少了53万、53万、32万人,正规劳动者总人数降到了3291万人。与此同时,临时工和派遣工等非正规雇佣劳动者人数在前三季度分别增加了106万、65万

① 生活保障金是日本对生活贫困的国民给予的必要的生活保障,是为了维持贫困者最低生活,帮助其自立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其给付标准是根据日本1950年出台的《生活保障法》制定的。

和79万人,非正规劳动者总人数达到了1964万人(如表3所示)。也就是说,安倍经济学使日本雇佣体制发生了质的恶化。

表3 安倍经济学作用下的雇佣形态的统计 (万人,%)

2013年10月	人数	所占比例
不包括各种职务的雇佣者	5256	
正规雇佣者	3291	62.6
非正规雇佣者	1964	37.4
非正规雇佣者中做零工者	9581	8.2
非正规雇佣者中的临时工	411	7.8
非正规雇佣者中的派遣工	121	2.3
非正规雇佣者中的合同工	282	5.4
非正规雇佣者中的委托工	116	2.2
其他	77	1.5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产业省2013年10月份公布的《劳働力調査》资料整理。

第二,如果企业不愿意增加正规雇佣的数量,在“企业主义”的调节模式下,企业对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必然减少,那么政府或社会应该承担起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的任务,但安倍经济学并没有这一方面的内容。因此可以预计,非正规雇佣劳动者数量增加的负面影响将继续影响日本企业的创新能力的提高,阻碍了日本“出口主导型积累体制”的发展。

第三,安倍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在于进一步推动劳动力的流动,但劳动力流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摩擦性失业甚至完全失业的现象,因此加强社会保障制度、提高最低生活保障金应该是安倍经济学的应有内容。但安倍经济学并没有“提高最低工资”、“消除差别性低工资”的内容,反而降低了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给付标准。从统计数据看,安倍内阁上台以来,共削减了740亿日元的生活保障金,同时增加了15%的公用事业建设费。关于此,尾藤(2013)认为,安倍经济学的政策路线“已经从对人的补贴转移到了对水泥的补贴”。^{[17](P34)}

四、结论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至少能够得出以下四

点结论:第一,安倍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的结构性改革难以达到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并会产生以下两个恶性循环:(1)在日本“企业主义”的调节模式下,安倍经济学将进一步导致非正规雇佣劳动者人数增加,并导致“劳动者整体收入下降→国内需求下降→企业投资减少→企业进一步减少劳动者的数量→劳动者整体收入下降”的恶性循环;(2)“非正规雇佣劳动者人数增加→企业对非正规劳动者职业培训减少→阻碍企业人力资本提高→社会生产力下降→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下降→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进一步减少劳动者人数”的恶性循环。

第二,安倍经济学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增加劳动者尤其是正规劳动者的雇佣人数和收入,但目前来看并没有这方面的征兆,反而看到的是正规劳动者人数下降、非正规雇佣劳动者人数增加、劳动者整体收入下降、最低生活保障金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操纵日元贬值引起能源和原材料等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无疑会加重劳动者的生活负担。

第三,安倍经济学实施一年来股市持续上涨,从这方面来看安倍经济学似乎卓有成效。为此安倍晋三最近在日本各大新闻媒体和国际会议上也

不断地大肆宣传安倍经济学的“成果”，其在竞选时所使用的“重返日本(Japan is Back)”的口号也在新闻媒体上频繁地出现。^[19]然而正如日银总裁黑田东彦所言的那样，企业在“大胆的金融政策”下获得的资金并没有用于新增投资上，而是流入到了股票市场并引起了股价的急剧上涨。究其原因，在安倍上台之前，由于国内需求下降，企业无法扩大投资，导致企业把大量的资金以保留金的形式存放在企业内部，据日银的统计，2013年上半年企业的保留金已经达到了大约260兆日元。也就是说，对于企业尤其是优秀企业来说，他们缺少的并不是资金而是投资方向，因此“大胆的金融政策”对于企业来说作用并不大，反而引起了股票的大幅度升值，制造了经济繁荣的假象。

第四，日本“出口主导型积累体制”强烈地依赖于和亚洲近邻的友好经济关系，尤其依赖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但目前中日、日韩关系遇冷，这必然制约日本的出口。而且2013年“李克强经济学”开始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终止了之前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创造国内投资需求的做法，^[20]这也不利于日本向中国的出口。

总之，安倍经济学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革导致了雇佣不稳定并降低了劳动者的整体收入，导致国内需求和投资下降，并在“企业主义”调节模式下导致社会生产力持续下降，影响了“出口主导型积累体制”的发展。因此可以说，日本股票价格的持续上涨并不能说明安倍经济学已经卓有成效，相反我们认为安倍经济学只能带来短期内的虚假的繁荣，从长期来看不过是“昙花一现”，甚至有可能是日本经济“失去的30年”的开始。

参考文献：

- [1] Paul Krugman. そして日本経済が世界の希望になる[M]. 東京:PHP新書,2013.
- [2] 本田悦郎. アベノミクスの真実[M]. 東京:幻冬舎,2013.
- [3] 浜矩子. インタビュー「アホノミクス」が5つ

の悲劇を引き起こす! [J]. 東洋経済オンライン, 2013,(5).

- [4] 山田久. 経済活性化につながる雇用制度改革[J]. JRIレビュー,2013,(9).
- [5] 浜矩子. アベノミクスの真相[M]. 東京:中経出版,2013.
- [6] 野口悠紀雄. 虚構のアベノミクス[M]. 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2013.
- [7] 易宪容. “安倍经济学”效果及影响的理论分析[J]. 国际金融研究,2013,(6).
- [8] 苏显扬,吕慧敏. 揭开“安倍经济学”的面纱[J]. 经济前瞻,2013,(146).
- [9] M. Aglietta. Régulation et crises du capitalism: L'expérience des Etats-Unis[M]. Paris: Calmann-Lévy, 1976.
- [10] R. Boyer. The Regulation Schoo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1] 宇仁宏幸. 构造变化と資本累积[M]. 東京:有斐閣,1998.
- [12] 山田锐夫. 日本资本主义と企业主義のレギュレーション理論[A]. 山田锐夫,Boyer. 戦后日本资本主义-調整と危機の分析[C]. 東京:藤原书店,1999.
- [13] 宇仁宏幸. 制度と調整の経済学[M]. 京都:ナカニシヤ出版,2009.
- [14] 严成男. 中国の経済発展と制度变化[M]. 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
- [15] 久本宪夫. 日本の社会政策[M]. 京都:ナカニシヤ出版,2010.
- [16] 吕守军. 日本劳资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基于调节理论的分析[J]. 教学与研究,2011,(12).
- [17] 尾藤广喜. 社会保障解体を道く生活保护基準「引き下げ」[J]. 世界,2013,(3).
- [18] Ujikane, K. Abenomics Could Widen Japan's Income Gap [J]. Bloomberg BusinessWeek, Oct 24th, 2013.
- [19] 日経・FT 共同特集. Japan is Back[J]. 日本経済新聞, 2013年10月30日朝刊.
- [20] 唐任伍. 李克强经济理念和改革思想述要[J]. 改革,2013,(7).

On the Abenomic's Structural Reforms to the Japan's Labor Market

——A Stud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rench Regulation School

Lü Shoujun¹, Yan Chengnan²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2. Faculty of Economics,
Niigata University, Niigata 9502181)

[Key words] Abenomics; enterprise doctrine regulation mode; output-led accumulation regime; Japanese-style employment system; structural reforms in the labor market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cumulation system and the mode of regulation of French Regulation School, analyzed the content and the features of the Japan's traditional employment system and the new Japan's employment system which before Abenomics's employment system, and considered that the increase of the non-regular employmen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for why the Japan's economy is stagnating; Secondly, analyzed the content and problems of the labor market structural reforms of Abenomics, and thinks that the Abenomics makes the employment system has undergone a qualitative deterioration; Finally, analyzed the surface prosperity of the Abenomics, considers that the Abenomics just can bring the short term and false prosperity, in the long turn it may be the beginning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of "lost 30 years".

[责任编辑 陈翔云]

* * *

“混合所有制视角下的国有企业”研讨会在清华召开

2014年2月27日下午,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公有资产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混合所有制视角下的国有企业”研讨会在清华大学甲所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以及国资委新闻中心、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及央企媒体联盟等科研学术机构和媒体的近30位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围绕国企问题展开的争论在当前已不完全是一个学术问题。围绕国企进行的讨论应明确一个原则,即国企和国有资本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新的形势下提出“混合所有制”,目的在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通过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实现它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行混合所有制要防止一阵风,不能一刀切。现在社会上总提国企改革,似乎只有国企存在问题,私企、外企不存在问题,这样的认识是偏激的、片面的。与会的专家学者表示此次研讨会将有助于大家加深对混合所有制以及国有企业的改革的理解,同时认为要加强相关方面的研究。据悉,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还将组织一系列相关研讨会。

(本刊记者 陈翔云)